

文革時期 京滬知青階層化的個人閱讀

• 孫沛東

摘要：本文關注文化大革命時期知識青年個人閱讀中的階層化問題，聚焦京滬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兩個階層子弟的閱讀飢渴和閱讀內容的變化。本文發現，上山下鄉運動中，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弟的閱讀飢渴較工農子弟顯著；知青一代開始有機會從正統的「紅色閱讀」邁向多元化的閱讀與自學。隨着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書籍報刊（尤其是「內部書」）經歷了從城市到農村、由兩個精英階層向工農階層擴散的現象。對文革時期知青一代個人閱讀的重新解讀，表明閱讀行動是一個雙重過程：文化價值的重新確認和文化資本的積累。

關鍵詞：階層化 上山下鄉 個人閱讀 知青 文化大革命

一 引言

中國大陸迄今尚未有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閱讀史學術專著面世，已有的調查研究和資料彙編主要聚焦1978年以後^①，只有少數專著涉及到文革時期知識青年的讀書活動和文藝創作。林培瑞(Perry Link)以手抄本的流傳為例，認為文革時期國家的革命話語遠遠未能徹底控制民眾的地下文學消費；地下文學的流行表明城市青年對主流政治文化的隔膜，但尚未形成異見文化^②。印紅標開拓性地系統梳理了1968至1976年知青思想活動的史實，將讀書活動視為青年思想活動的一種存在方式^③。潘鳴嘯(Michel Bonnin)提出知青群體中存在一種知青另類文化，認為在沒有獨立、真正的思考和表達空間

* 本研究是2015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搜集、整理和研究」(15ZDB05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的前提下，這種地下文化在當時意義重大^④。楊國斌指出上山下鄉時期的地下文化是對革命文化的「去神聖化」，知青通過各種形式的「自我書寫」生產出對自我和社會的新認識^⑤。鄒振環對文革時期上海的翻譯出版研究表明，閱讀內部發行的「皮書」系列為「荒蕪年代」走來的文化人最先接受現代西方新思想作了重要鋪墊^⑥。宋永毅認為上山下鄉運動推動了地下讀書運動的發展，知青的地下讀書運動為文革後「文化復興」做了理論和人才兩方面的準備^⑦。此外，還有一些資料搜集性研究，有助於我們了解這一時期地下文化的生產及消費^⑧。

上述研究大多是從比較寬泛的角度出發，描述知青一代地下閱讀的大致樣貌，但由於中國大陸區域差異、階層差異、性別差異、政策差異、單位差異等客觀存在，對於文革時期的知青閱讀需要進行更為細緻和精準的研究。此外，對精英個人閱讀史的研究也表明，與靜態、獨立的言論文本分析相比，研究精英的思想與閱讀間的互動，更能「拓展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空間和視野」^⑨。本文關注文革時期知青個人閱讀中的階層化問題，聚焦京滬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弟的閱讀飢渴和閱讀內容的變化，發現隨着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書籍報刊（尤其是「內部書」）經歷了從城市（主要指京滬）到農村、從兩個精英階層向工農階層擴散的現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聚焦知青一代中的「老三屆」^⑩。廣義的「知青」是指「所有未能繼續升學而上山下鄉的青年」^⑪，文革前接受了教育的小學生或中學生，在「上山下鄉」這個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所組織、分配或自主選擇到農村（或連續從事農業生產）、廠礦、軍隊、幹校和滯留城市的那一代青年人。按照去向，本研究中的知青包括五類：農村的插隊知青、廠礦的青年工人、軍隊的青年軍人、幹校的青年職員^⑫和城市「社會閒散人員」（有城市正式戶口的社會無業人員）^⑬。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分為四個方面：（1）口述史影音資料：筆者在京滬兩地完成的三十五宗深度訪談，其中包括「紅二代」知青、出身幹部和知識份子家庭的知青，以及工農和城市平民階層出身的知青；（2）大量知青贈送、公開出版或個人自印的知青回憶錄、自傳、日記、資料選編等^⑭；（3）方志資料：從2014年出版的六卷本《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中輯錄出三萬字的知青讀書資料^⑮；（4）當時參與內部發行和出版審查的一些重要人物的口述史及回憶文章、現存的內部發行讀物（「內部書」，又稱「皮書」，包括「灰皮書」和「黃皮書」等），以及一些重要報導和檔案等。

知青閱讀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在上山下鄉運動中，知青一代經歷了從城市到鄉村（廠礦/農場/兵團/軍隊等）、從學校到社會的重大轉變，感受到理想與現實、宣傳與事實、意識形態與社會運作的巨大裂縫。因為困惑、使命、責任、習慣、愛好、聲望、身份、地位、無聊和逃避等等，加上1970年大學試點恢復招生後，給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女帶來了新的希望——「大學夢」，促使部分知青想盡辦法，找來書本/文革前的初中和高中教材，進行各種形式的個人閱讀與書寫。以下將討論文革時期京滬知青個人閱讀中的階層化特徵，研究問題聚焦於：誰，甚麼時候，在哪裏，讀甚麼，為甚麼？

二 靜水深流：階層化閱讀

與社會學一般所指的社會化媒介 (socialization agents) 類似，知青閱讀來源主要有家庭、學校、社會 (包括工作場所) 和同輩群體四個方面^⑥。以下對知青一代閱讀行為的分析，也主要集中在家庭、學校、上山下鄉期間，走向社會以及與同輩 (或長輩) 群體的多種「思想性社交」。

(一) 家庭閱讀

在知青一代中，那些能夠以文革前小學畢業文憑，在恢復高考招生後考上研究院者，很多人歸功於家學淵源、富有藏書、長輩教育的結果。1968至1973年，作為青年讀書主要來源的書店和圖書館都不能正常開放，私人藏書對於知青一代的個人閱讀意義重大^⑦。較早開始閱讀家庭藏書的知青大多出身知識份子或幹部家庭，他們很多人早慧，讀書多，且讀到好書。

黨內政工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子弟的優勢是藏書多，接觸面廣，信息量大。「老兵」靠邊站以後，幹部子弟李大同成為逍遙派，開始大量讀書：「如果說幹部有特權，那就是資訊特權。」其父1964年任中央農林部政治部宣傳部長，經常獲贈各個出版社的新書，其中包括大量所謂的「封資修」書籍和「內部書」，這些書成為他文革時期的閱讀資源。他們大院裏有個讀書會，大家比賽讀書，發現別人看過自己沒看的書，會感到恥辱^⑧。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回憶讀初中時在家讀過很多書，「我甚麼書都愛看。我們家有很多書，我爸爸是管出版的嘛，有很多贈書」。1963至1966年她在復旦附中住讀三年，每周六回家不帶書包，「一回家就看看有甚麼新書，半夜眼睛看累了，還要看」^⑨。

至於普通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知青如歷史學者盧漢超，沒有初中、高中以及大學文憑，但卻成為文革後第一批研究生，他將之歸結為家庭因素：「我想我之所以入了歷史這一行是有些家學淵源的。」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廣東順德小有名氣的國文老師，其父年青時還是當地最有規模的一所學校的校長，抗戰後離鄉到滬謀生，但對文史的愛好終身不渝。盧漢超就是在他的啟蒙下習讀中國古代史。文革中父親以抄家劫餘的一套《古文觀止》和《通鑿綱目》作為課本，堅持讓他唸古文。文革後，當他看到上海社會科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招研究生所列的參考書有《古文觀止》，儘管不知道研究生是甚麼，也不知道作為導師的著名歷史學家唐振常是誰，但憑着他在文革期間所打下的古文基礎，順利地考取了研究生^⑩。

知青一代中那些文革前畢業的初中生，能夠在1977至1978年考入大學的，也大多出自書香門第或幹部家庭。文革十年，儘管他們只是初中生，但能夠廣泛閱讀，且讀到不少好書。歷史學者、77級被訪者J讀到十二卷《魯迅全集》甚至市面上較為少見的《文史資料選輯》，後者從其時任學部委員和全國人大代表的伯父處獲得^⑪。此外，即便在政治上被打倒，高文化資本仍舊是高級知識份子在子女教育上的明顯優勢，為其子女在恢復高考後進入高等院校深造奠定良好的基礎。文革伊始，詩人流沙河被押回四川原籍勞動改造，孩子不能上學，流沙河決定自己來做教師。他憑藉記憶，從《詩經》到《毛主席

詩詞三十七首》默寫出 225 首，用作孩子的語文識字課本。他還自編了英語課本共十冊，晚上教孩子朗讀。「四人幫」倒台時，他的孩子已經寫了四本英語日記²²。

(二) 學校閱讀

與上述知識份子相比，1949年進城的中共幹部教育程度大多不高，除了各類幹部必讀書籍和馬恩列斯毛之類的「紅色經典」外，職位與意識形態和科教文衛無關的幹部家中並無太多藏書。幹部子女的閱讀優勢，主要體現在學校階段：幹部子弟學校的師資和圖書館等各種配套資源明顯優於多數工農子弟就讀的普通學校。此外，幹部子弟因為同學關係和居住分區（如大院²³）所建立的「朋友圈」，也成為建立各種讀書小組及書籍流通的基礎。

1952年5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批准《幹部子女小學暫行實施辦法》，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機關及團體可以根據需要設立幹部子女小學。同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批准中央軍委在各地創辦子弟學校十九所，專門解決部隊子弟入學問題。自此，幹部子弟學校開始按照等級享受待遇，1952年至1955年7月，幹部子弟在幹部子弟學校或一般學校的中學、小學、幼稚園都是公費生，享受供給制。1953年，周恩來視察北京101中學時，告誡學生不要滋長特殊化思想，不要脫離勞動和群眾。毛澤東稱這類學校為「貴族學校」。1955年8月起，幹部子弟在校費用才轉為由家長負擔²⁴。在幹部子弟學校，即便後來開始招收少量的工農子弟，但在校內仍舊設置幹部子弟班和工農班，工農班的學生是自費生。1964年後中央貫徹階級路線，少數工農子弟插入幹部子弟班，以北京四中為例，學生成份號稱「五高」，即高級幹部、高級知識份子、高級職員、高級資本家和高級民主人士²⁵。一般而言，每年級有一班是重點班，高幹子弟最集中。被訪者D原為四中67屆初二學生，班內同學的家庭出身分為高幹、知識份子和工農，「我們班42個人，大概15個是高幹子弟，工人或者城市貧民子弟不到10個」。文革時期，北師大女附中、北京101中等亦大致如此。

北師大女附中和一附中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間都是全國最好的中學，匯集了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因為接觸面較廣，圈子內的知識傳播無疑處於全國同一代人的前列。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的被訪者L坦言，重點中學尤其是幹部子弟聚集的學校，其配套和設施（特別是圖書館）的水平要比普通學校高出很多：「我們學校有圖書館和閱覽室，每天中午吃完飯以後不睡覺，我們是會看書的，閱覽室是開放的，我記得當時就看了好多書。」文史學者、被訪者丁東就讀的北師大一附中是個幹部子弟比較多的學校，他亦指出「幹部子弟的資訊來源多於平民」。

除中央幹部子弟學校外，地方上的幹部子弟往往因為家庭出身、同學關係和居住地等原因較易形成相對固定的圈子。被訪者W的父親是山東籍南下幹部，曾參與接管上海港，是軍管會成員之一，後來一直在新成立的上海港務局工作；母親1949年前已在上海某小學任教師。據W憶述：1966至1968年停課鬧革命時期，「不上課就閒得慌，閒得慌就要找事幹，很重要的就是找書

讀」。他瞞着父母，把自家的書拿出來，與年齡相仿的鄰居小朋友一同建立了「換書網絡」，交換看書。1968至1971年他入讀上海中學，與同班同學組成十多人的讀書小組，其核心骨幹是同住在玉田新村的十幾位男生。玉田新村雖名為工人新村，但住戶中幹部和知識份子比例相當高。這些「玉田男生」大多出身幹部或知識份子家庭，家中都有藏書，且都擔任校幹部或班幹部。該小組每周一兩次定期聚會，大家相互借書，互談讀後感。

這個讀書小組的活動主要在幹部子弟家裏輪流舉辦，一是因為有空間，家庭住房夠大。按照當時的分房標準，基本上是工人家庭一間，達到一定級別的幹部（技術幹部/管理幹部/政工幹部）都是兩間；二是因為家長比較支持。當時社會上經常會揪出一些所謂的「反革命小集團」，但只要這些讀書和討論不涉及太多敏感問題，父母便不會過份干涉。基於父母的政治和文化地位，這個讀書小組的大部分骨幹具備經濟條件，還養成了逛舊書店買舊書的習慣：「新華書店是賣新書，福州路的中國書店主要是賣那些收回來的舊書。它又收又賣，實際上就相當於是一個社會化的換書網絡，是我們這些文革讀書人的更大的一個平台。」

（三）上山下鄉時期的個人閱讀

知青離開原先生活的城市後，除年齡、性別和教育程度這些常規變數外，家庭背景、來源地、工作和生活的地域、工作/勞動單位的性質（農村/林區/漁區/廠礦/建設兵團/勞改農場/勞教農場/軍隊等）、工種、知青人數與當地人口的比重，以及離開城市的時間長短等多個變數，對知青一代的個人閱讀行為、社會獲得（social attainment）等方面均具有影響。限於篇幅，這裏僅討論書籍的來源和傳播，以及家庭背景、工作和生活的地域、工作/勞動單位的性質對階層化的個人閱讀的影響。

上山下鄉時期，知青一代的書籍，尤其是「內部書」的流散和傳播途徑主要有抄家（幹部或知識份子家庭）；偷竊（圖書館中流散出來的書，如清華附中等重點學校的「武鬥」使學生讀到原先校領導層專用的圖書館流出的書籍）；交換^{②6}；私下或憑介紹信購買（從廢品站和造紙廠低價購買）^{②7}；各類手抄本或翻印書（地下工廠印刷的各類出版物）^{②8}；民間的私人租書和「跑書」^{②9}活動的存在也使知青獲得了書籍。

筆者認為上述書籍最初主要是在各種「圈子」內傳播，反映出鮮明的階層化特徵，隨着運動的展開和進行，上述書籍報刊，尤其是作為京滬某些青年小圈子中的讀物的「內部書」，呈現出從城市（主要指京滬）向農村的地域擴散以及城市幹部與知識份子子弟向普通工農及城市平民子弟的階層擴散。也有學者認為不宜誇大文革時期的地下或半地下閱讀運動及其政治和文化遺產，因為「內部書」作為一種獲取不易的稀缺資源，注定所謂「青年讀書運動」只是小部分青年（主要是京滬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女）的閱讀活動；當時的京滬二地與「外地」猶如十九世紀俄羅斯的聖彼德堡、莫斯科與「外省」，知識圈的文化氛圍相去甚遠^{③0}。如文革時期，身處黑龍江農場的中學生張鳴從未聽說過「灰皮書」，這位政治學者直到1980年代才真正見識「灰皮書」^{③1}。正是在上山下

鄉運動中，「內部書」隨着上述部分京滬知青的足迹和人際交往實現了地域擴散和階層擴散。

就工作地域和性質對知青個人閱讀的影響而言，在工礦工作遠比插隊/場的普通知青的閱讀時間有保證，因為與城市和城市原生家庭的空間距離較近，更有條件閱讀。對於在農村/農場/牧場插隊的知青而言，農閒以及餵豬/放牧/看青/燒鍋爐等較輕鬆的工作使他們有較多時間讀書。至於進入廠礦的知青，因為有集體食堂和宿舍等便利設施，工作之餘是他們常規且有保證的閱讀時間。據一些受訪者回憶，鑒於所處地域和城鄉等因素，「林彪事件」、尼克森 (Richard M. Nixon) 訪華和恢復高考，對知青閱讀的影響大小不一，甚至沒有多少影響^②。

至於家庭背景對知青個人閱讀的影響，主要呈現在以下七方面：

第一，擁有較高社會地位和文化資本的父母，會想方設法為子女改善生活環境甚至脫離上山下鄉的命運。例如，鄧小平有五個子女，1970至1972年間，他為大女兒鄧林的畢業分配問題，為大兒子鄧朴方的治病問題，為小女兒鄧榕和小兒子鄧質方的工作問題，先後六次給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能為兒女想到和做到的，他都竭盡全力做了^③。又如，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1963年初中畢業後執意去新疆，張勸說無效，便請當時的上海市團市委書記出面，以「學好本領，才能建設國家」為由，勸女兒升入高中繼續學習。張維維同年成為復旦附中首屆學生及住校生，張春橋又動員鄰居、時任復旦大學黨委書記的楊西光找女兒談話，以「住校很艱苦」為理由勸其走讀^④。

第二，即便不能阻止或無法幫助子女避開上山下鄉，這些高幹家長都會在子女離家之前，反覆囑咐他們不要忘記學習。例如，萬伯翱高中畢業未考入大學，時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北京市副市長的父親萬里與老朋友潘復生商議孩子安排問題，潘剛結束了在河南某農場的勞動改造，被分配做全國供銷總社主任。他建議把萬伯翱安排到自己勞動過的這個農場。兒子插隊臨行前，萬里鄭重叮囑他要做一個有文化有知識的農民，「農村是個大學校，你可以研究植物學，你可以研究養殖業，你喜歡寫作，下鄉豐富生活閱歷，一樣可以成為作家」^⑤。1963年萬伯翱被周恩來樹立為「幹部子弟上山下鄉典型」。下鄉期間，萬里多次寄去《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簡史》等書，「望在空閒中，認真閱讀，並做好筆記」。儘管文革開始後因為受到父親的牽連，萬伯翱短暫成為「黑黨委的小黑瓜」，但是隨着父親的「敵我矛盾人民內部處理」，他於1972年獲得農場兩個工農兵名額中的一個，成為河南省的第一批「工農兵學員」^⑥。又如，儘管中共高幹李銳的女兒李南央對母親情感複雜，一度曾相當怨懟，但是對母親在「知識無用論」盛行、猛批「白專道路」的革命年代，讓她千萬不要忘記學習，即便當一輩子工人也要有文憑的教誨十分感念。在筆者對其訪談中，她說：「我要感謝我媽媽一輩子，我媽媽說得非常明確：進工廠就好好當工人，當工人也要有大學文憑。這我始終是記住的。」

第三，不同家庭出身的知青，離開城市所攜帶的行李不盡相同，體現出階層化分野。部分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知青，離開城市時大多攜帶了一定數量的書籍。而且由於他們曾在上學階段組織同階層的讀書會和閱讀沙龍，下鄉後一般成為當地讀書小組的發起人和主要踐行者。1970至1976年，

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出身的北京知青張刃在山西農村插隊六年。下鄉時他帶了一個老牛皮箱，除了馬恩列斯著作、《毛澤東選集》、《魯迅文集》、《革命大批判文選》和《革命大批判文章選編》等，大多數是「禁書」或「準禁書」，書箱足有二三百斤重。他發現，當插隊成為眾多知青的共同宿命時，家庭的因素和影響（家庭教養、經濟條件和生活態度）就顯現出來了^⑦。看到周圍同學沉溺於抽煙喝酒混日子，他組織了學習小組，同學自願參加。很快，因為體力勞動太重，讀書和讀甚麼書都成為了個人行為，能聊到一塊的知青偶爾會一起探討讀書體會。他還與另外一個知青跟老鄉借房子，用土坯壘桌椅，每天放工後，點着油燈安靜地讀書、記筆記、寫日記和信，「那是我一天勞動後的極大精神享受」^⑧。相比之下，經濟條件較好的上海市民家庭子女上山下鄉所帶的行李中，物資似乎多於書籍。1970年3月19日，《文匯報》刊登讀者評論，指出知青到農村去，應該帶的是「毛澤東思想」，父母不應「給子女買的東西越多越好，箱子裝得越滿越好，行李越重越好」，應該「給子女贈送毛主席的紅寶書」，而不是大量物資。如新榆中學一次80人去淮北，大型行李48件，平涼中學一次14人去淮北，大型行李9件。這些行李裝有大米、卷麪、醬菜、食糖、鹹肉、鹹魚、肥皂、草紙等，有的還攜帶豬油、豆油、醬油，個別甚至還帶煤球和煤球爐子^⑨。

第四，上山下鄉期間，以初/高中就讀學校為分野的圈子化/階層化閱讀現象得到繼續強化。77級被訪者B的父親是原四野教官，1949年以後擔任國家某部中層幹部，母親是小學校長。父母「參加工作前，文化程度不高，有點知識都是後來在部隊學的」，但比較開明，對他們兄妹三人讀書管得不嚴，文革開始後因為在單位多少受到些衝擊，無暇限制子女的閱讀。他1966年畢業於清華附中，認為去插隊前自己讀書屬於「亂看」，因為哥哥是清華附中的紅衛兵領袖，人脈廣泛，圖書來源很廣，「他能找到的，我一般都能看到」，所以他下鄉前的閱讀量比周圍的人更大。1969至1971年他在陝西延川縣插隊，試圖系統閱讀馬列經典，但實際上勞動艱苦，農閒時間不多。他指出：「帶的書不多，但是也夠看了，因為勞動，晚上油燈底下很艱苦地看一點。1958年毛主席向黨內高級幹部推薦的三十本馬列著作，那個時候我們都想以世界革命為己任，都想着當志願革命家，所以覺得推薦給黨內高級幹部的就是我們應該看的。」1971至1975年他在瀋陽軍區某部當兵，他所在的部隊長期駐守海島，與外面的社會比較隔離。這期間，因為有個固定安全的閱讀和換書圈子，他大量閱讀，而且做了六本讀書筆記。這個圈子包括他哥哥、清華附中的同學，以及來自上海、杭州的四五個關係比較好的朋友，「經常聚在一起讀書，並且小範圍內暢所欲言。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書也多了，有一些書也經常能通過郵局寄到部隊。我們十來個，有一本書大家就互相傳，所以即便在偏僻的海島上，外邊出的書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格瓦拉日記》那本書是1971年翻譯出來，1972年我們就看到了」。

第五，知識份子或幹部家庭子弟，即使身為工人，也感受到閱讀飢渴，傾向延續閱讀和學習的習慣，被訪者也證實了閱讀飢渴是一種階層化的產物。這些被訪者在插隊或在廠礦期間，無一例外多方尋找書籍，並訂閱報紙，學習外語。被訪者J在上海郊區插隊六年，用生活費訂閱《人民日報》和

《新華社每日電訊稿》，並從上海家裏拿來母親訂閱的《參考消息》，用蠟線和牛皮紙把三種報紙裝訂成冊，了解時政和國際形勢；此外還背毛澤東詩詞以及跟廣播自學多門外語。政治學者蕭功秦1965年畢業於上海虹口中學高中部，因出身問題未能被北京大學錄取，被分配到上海某區的一家機械廠當學徒，並在工廠開始了十二年的艱苦自學：「中學畢業以後我進了工廠，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時期，作為一個工人，卻有幸可以在基本不受干擾的情況下業餘讀書，從《通鑑紀事本末》到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批判資料，從哲學到文學，從美術史到考古報告。」期間，他做了近百萬字的讀書札記，1978年考上了文革以後的南京大學歷史系第一屆研究生^④。李南央在1968至1979年於陝西汽車製造廠當工人。在筆者對她的訪談中，她提出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弟都在重點學校上學，在校期間多數學習底子好，有求知的渴望。因此，同樣是插隊或在工廠做工，這些人仍舊保持對知識的喜好和追求。她發現當年2,200名先後進廠，後來以各種方式離廠的北京知青中有些去了美國，發展得不錯的四五個男工全部畢業於北京四中，因此認為當時學校給他們打下的教育底子非常重要。當年青工中流行打撲克，打撲克的人多數來自北京的普通中學，工人子弟比較多，讀書的人非常少。她所在的車間來自北京崇文區和宣武區的市民子弟多，所以少人讀書；而來自西城區和海淀區的青工都畢業於重點學校（如101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等）。曾當煤礦工人的被訪者印紅標明確指出重點中學畢業生感受到「知識飢渴」：「我感到一種知識飢渴，我們這些重點學校的學生有知識飢渴。我周圍那些人好多人都沒知識飢渴。社會在當時在培養人的時候，它是分層的。」

第六，階層化閱讀實際上也關乎階層的身份、地位，閱讀和學習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一些知青的婚戀走向。李南央的婚姻因工廠期間學習高數的共同經歷而締結。她的先生畢業於北京四中，兩人在沉重的體力勞動之餘一起學高數：「我們倆開始的時候互相看得上，就因為我們都在學高等數學，後來就一塊做作業，互相切磋，當時他就覺得我是整個山溝裏唯一在學高數的女孩子。」一個相反的例子是，即便是同齡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卻因為閱讀差異戀愛不成。李銀河與初戀男友的戀情「發展並不順利，主要是兩個人三觀不同。我們雖然是同齡人，家庭背景也差不多，但是我二十歲看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世界名著，因此靈魂基調與當時的青年人大為不同，用當時常見的話來說，就是有了『小資產階級情調』」。而她的初戀男友從小就被父母灌輸「棉暖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之類的紅色價值觀，不能欣賞她的「小資產階級情調」^⑤。

第七，比較而言，工農子弟的閱讀飢渴和閱讀行為並不顯著。農民家庭出身，後來成為知名雜文家和時評家的鄢烈山承認年輕時讀書不多，但認為原因是自己缺乏志向，不能將一切都諉過於文革十年：「1973年9月唸中師後，如果自己渴望讀書，還是有不少書可讀的，至少可以借閱馬恩列全集和魯迅全集。我當時的精神狀態最缺的就是『志』，志向和意志：我要學那麼多做甚麼，能做甚麼？」1974年冬，他得到一本《唐詩選》和一本《普希金集》，也背誦過那首著名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但當時並未被這詩首打動：「我沒覺得自己有甚麼『悲傷』和『憂鬱』，因為我並不覺得誰欺騙了我；誰也沒有承

諾過給我這個農民的兒子甚麼特別美好的前途，所以也不會相信有甚麼特別快樂的日子在前方等着我們。」^②同樣，被訪者Q回憶1966至1972年間讀書多是漫無目的，「就是為了打發時間和精力。因為對生活的走向一無所知，看書只是一種調劑生活的閒趣，並沒有說我要從中獲取營養」。求知的渴望植根於對未來的嚮往，對理想目標的追求與執著，這種熱望與家庭社會化和學校社會化的形塑緊密相關。知青一代中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子女的閱讀和學習習慣，實際上是一種家庭價值、傳統和文化，即「慣習」^③。

(四) 知青一代的「思想性社交」

事實上，與良師誼友的「思想性社交」^④亦是文革時期一些知青獲取知識、終身受教的一個特殊途徑。文革時期的「思想性社交」與文化管制有關，後者不但改變了書籍市場的供求關係^⑤，也使師生共同學習的方式出現「返祖」的特點。1970年初中畢業後被分配進北京東郊某化工廠當工人的解靈璋，跟被稱為廠裏大筆桿子的師傅陸俊讀書，讀書方式是「口傳心授」：陸師傅像私塾先生一樣，教他背誦古典詩詞或文章，文化傳承的方式「又回到孔夫子的時代，師生之間不再借助於印刷品，而只能靠直接的、面對面的交流」^⑥。

「思想性社交」還發生在公園、茶館、圖書館、私人家裏等一些公共和私人空間，以及通過圈子內固定長期的書信往來等形式形成的紙質空間。在城市，文革「打砸搶」之風過後，因厭煩了大學校園中的派系爭鬥，以「肝炎」為名在家中「泡病號」的大三學生柳白在北京西城區的北海茶館「蹲茶館」，期間從與著名音樂家潘懷素，演員于洋、李敬堯，儲安平的四川好友李如蒼等交往中獲益良多。儘管當時的茶客都謹言慎行，但茶館裏還是有人以史議政。這些茶客主要是「平安過關」的形形色色退休老者、倖存者、有侃山愛好的普通市民以及像柳白一樣「泡病號」的知青。柳白回憶：「在文革人與人彼此漠視的冰冷的環境下，也許這裏就是整個京城裏最溫暖的地方。」^⑦

1965年畢業於上海復旦中學初中部的知青R，因為嚴重的家庭歷史問題，出身知識份子家庭且成績優異的他被送進上海一所廠辦技校當一名半工半讀的學生。文革開始剛半年，他就聯絡上了幾位住在長寧區新華路及附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他們大多出身於知識份子或過去所謂的資產階級家庭：「這些同學，朋友或鄰居與我年齡相仿，學業精進，天賦極高，家教卓越，思想開放，且在當時黑雲壓城的文革歲月中不甘自我沉淪；同我一樣，都在偷偷地勤奮學習英語，日語，文史哲等學科或西洋樂器。」1969至1971年間，他又與一些以各種理由避開上山下鄉而賦閒在家的其他青年聚集在長寧區中山公園，以練太極拳為名，旨在學習外語，共同閱讀和討論。他們讀英文原版小說，並且跟原聖約翰大學高材生學習英國文學^⑧。

文革中，人們被迫參加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對於精神活躍、有獨立思想的人來說，就只能把自己的內心世界完全隱藏起來，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得與其他人一模一樣。他們用獨特的方式，如極其私密的個人通信、與朋友共同讀書或聚談來構建另一種精神生活。先以手抄本形式流傳，在北大、清華學生傳看，在文革後出版的《公開的情書》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⑨。

三 「飲鳩止渴」：從主流閱讀到非主流閱讀

根據當時的閱讀群體和閱讀情況，筆者歸納為賦閒閱讀、業餘閱讀、公務閱讀和機遇閱讀四個層面，闡釋知青閱讀內容從主流（「紅色經典」）到非主流（外國文學、「內部書」）的變化。

（一）返城待業青年：賦閒閱讀

高幹子弟李銀河1965年考入北師大女附中，1969至1972年在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插隊三年。回到北京後因無法落戶，在家待業半年。期間讀完了家裏收藏的和從父母的老同事家借來的所有外國文學名著，並寫了好幾本讀書筆記。她用「飲鳩止渴」來形容當年讀書的飢渴感覺和瘋狂勁頭：「當時所有的外國文學名著都被打成毒草」，但就算是毒藥也要將它喝下去，因為在內蒙的三年讓她飽受物質和精神的折磨，精神飢渴達到極點。如果繼續留在兵團勞作，而不是回家，哪裏有這麼長時間讀書？這段讀書經歷讓她「終身受益，獲得了基本的審美鑒賞力，獲得了脫離周圍愚昧環境的世界觀和人生觀」^⑥。

同樣是在北京，1971年底到1972年初，很多大院子弟紛紛從插隊的村莊和農場返城，在北京形成各種小圈子，據說總人數近三百多，小圈子時有交往和交叉，成員也在不斷變化。魯雙芹家所在的鐵道部宿舍的「文化沙龍」的成員和「無名畫會」以及後來自辦「星星美展」的畫家時有往來。他們「每天讀書討論，四處亂串，不斷結識新的朋友，享受着自由自在、充分交流的喜悅」^⑦。

文革開始後，很多被主流意識形態視為「毒草」的中外文學名著，仍在上海的私密小圈子流轉。很多知青閱讀「歐美文學名著，十之七八都以這種閉門讀禁書方式完成」^⑧。進入1970年代，很多熱愛讀書的上海知青和青工才能從各級圖書館借閱到國外文史哲專著^⑨。

（二）城郊工人：業餘閱讀

被訪者L的父母為國務院商業部公職人員，家中從小就有讀書的傳統。文革爆發之初，她就讀於北師大女附中，1969年離開學校，在北京郊區當工人，1973年作為工農兵學員回京讀大學。她認為1969至1973年是她讀書最多的時期，通過父母單位的圖書館和鄰居借閱了大量國外小說和史政書籍。「要說讀書的話，實際上讀最多的書還是文革開始之後。文革開始之前基本上全是那種正面的書，文革開始之後，就甚麼書都可以看了。」身為歷史學家的78級被訪者Z以1974年為界，將自己的讀書生活分為兩個階段：一、中學時代，很多書是當時學校規定要讀的，當時讀書沒有系統，「基本上是拉在籃裏就是菜」；二、青年時代，1975年參加工作後，先後在靜安區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盧灣區圖書館等讀書：「1975到1977年那一段，確實是讀了很多書的，我曾經給學生賣弄過，一口氣在黑板上寫出100本外國小說的書名、作者和譯者。」

(三) 寫作組成員、圖書館人員：公務閱讀

1971年7月，上海市委寫作組正式成立。徐景賢作為總負責人，朱永嘉、王知常、蕭木最初擔任領導核心。1973年5月，蕭木調到北京任王洪文的政治秘書，王紹璽補入核心。到1976年，寫作組本部及下屬周邊組織人員發展到近五百人，是文革期間最龐大的寫作組。文革期間，朱永嘉擔任上海市革委會常委，主管寫作組，創辦《朝霞》、《學習與批判》、《自然辯證法》等刊物，實際上是上海意識形態領域的主管^{⑤4}。

根據筆者對朱永嘉的訪談，文革期間的抄書風潮中，從上海市諸多知識份子和幹部家抄來的書主要堆放在圓明園路自然博物館的樓上和徐家匯藏書樓兩個地方。1971年起，寫作組每周四下午勞動，就是去這兩個地方整理圖書。寫作組成員看到有用的好書就挑出來，放到寫作組所在地丁香花園的書架上。後來書籍愈來愈多，便成立了專門的圖書館，供市委領導和所有寫作組成員查閱，並配有專門的圖書館管理員。1973年王洪文進京，後來毛澤東囑咐他多讀書，上海市委就從這個圖書館挑了一大批書籍送給王洪文。

寫作組成員還可以看到港台新書和從大學圖書館借閱的圖書（從復旦大學教授家所抄之書，也封存在校圖書館）。同時，上海圖書館是文革期間唯一一個繼續購買國外書刊的圖書館^{⑤5}。負責寫作組期間，朱永嘉一直用地方外匯去港台購書，國務院來查，他便聲稱是為毛澤東、張春橋和姚文元買書。此外，文革期間上海市委並未停止訂閱港台報紙，寫作組下屬的編書小組往往根據這些報紙上的新書廣告下單訂購，這些費用都用地方外匯支出。文革爆發後，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下令將所有圖書封存起來，朱永嘉在校黨委常委會上要求重新向師生開放，因此該校圖書館於1968至1976年間有對外借閱服務。在編輯《自然辯正法》時，寫作組還組織了復旦大學理科的一些老教授在復旦圖書館翻譯科普文章。後來專家提出資料不夠，要向國外購新書，並開列書單給負責人之一的王知常。1974年上海市中日友好代表團去日本，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特批了500美元讓王知常隨團出訪時採購圖書^{⑤6}。由此，寫作組成員得以大量閱讀社會上普遍讀不到的、最新出版的書籍文獻。

此外，文革期間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圖書館管理員有得天獨厚的閱讀資源和機會。1972年，丁東離開插隊的山西農村，借調到省委調研室，擔任下屬的圖書館管理員。文革前省委、省人民委員會等單位的圖書都搜羅到這個圖書館，甚至文革時內部發行的圖書，該館也有權購買。「在整個社會沒有書讀的時代，我卻得到了一個難得的讀書的環境。」在此期間，他閱讀了《新階級》、《斯大林評傳》、《第三帝國的興亡》、《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甚麼》和《美國與中國》等當時出版的「內部書」。在他看來，「前十七年」和文革時期的主流閱讀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滲透和無法逃避的灌輸，這種灌輸難免讓人產生抗拒心理；一旦有機會閱讀非主流讀物，自然產生強大的吸引力：「正是這種非主流閱讀不斷地向主流閱讀形成的底色發出挑戰，促使我從迷信走向懷疑，從蒙昧走向蘇醒。」^{⑤7}

在上海，陳思和1974年被分配到淮海路街道圖書館工作，這個工作的好處是不用買書，可以直接去書庫看書。1975年評法批儒，當時劉禹錫被認為

是法家，圖書館應邀撰寫《劉禹錫評傳》，陳所在的工人書評組在兩位老先生指導下工作，他才知道甚麼叫做學問：「其中一位黃老先生指導我讀劉禹錫的詩和編年文，教我怎麼看平仄和韻律。在他的指導下，我開始正規地讀書。」當時盧灣圖書館（對淮海路街道圖書館有業務指導關係）還組織年輕人學習以群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又請來很多大學教授授課，講外國文學，「我喜歡文學評論，是從參加他們的書評工作開始的」^⑥。

（四）普通知青：機遇閱讀

儘管是否喜愛讀書有天性的因素，但是工農子弟即便天生就有閱讀和求知的熱望，實現這種願望的客觀條件卻是未如理想，甚至根本不具備。對於村鎮幹部和教師子弟而言，他們中有些人並非沒有閱讀和學習飢渴，只是囿於物質和文化條件，他們很大程度上是無書可讀。不過，反覆閱讀僅有的「紅色經典」或少數可以接觸到的詩歌古文，也為工農和城市平民子弟帶來獨特的閱讀體驗和意外的後續影響，例如從知青當年的日記、工作筆記、書信，後來出版的各類自印書籍中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上，都可見他們習慣用古體詩抒發情感。1980年代經濟欠發達或偏遠的中國農村中，年輕人仍舊無書可讀，甚至到了1990年代，即便他們已經進入大學——如果不是書刊資源配套良好的重點大學，他們仍舊很難讀到新書和好書。中國幅員遼闊，區域差異懸殊，學校（從幼兒園起）所起的階層分化作用一直十分顯著。

對文革時期的工農子弟而言，與閱讀「有字的書」相比，1966年9月起開始的「大串聯」、躲武鬥等活動使他們第一次獲得了與精英階層子弟同等的、通過出遊去閱讀社會、認識社會這本「無字的書」的機會。現為歷史地理學教授的78級被訪者S回憶：「為了躲武鬥，我就到溫州親戚家遊玩。坐河輪從塘河開到溫州，船慢慢開，我慢慢看風光。有時候下船步行。這樣邊走邊看了溫州很多比較發達的地區交通便利，村莊密集，這樣走走看看，倒也增加了很多的地理上的感受。」因為閱讀受限，有些出身平民、後來比較成功的知青傾向弱化閱讀的作用，而強調其經歷、見識和交友等其他學習途徑。哲學教授、77級被訪者Q認為：「讀書對我們文革時期讀不到書的年輕人真的無所謂，見識就是開闊視野。經歷的豐富對人的發展最厲害，並不是說我看了哪本書對我來說提升最快。」他認為進入大學前，對思想上渾渾噩噩的「灰色群體」青年而言，單調的「紅色經典」書籍不能成為青年人的朋友，因為他們不能通過閱讀看到人生的希望和改變現狀的可能性。進入大學後，突然發現人生的路可以這樣走，又幸遇良師指點，開始認識到「單一化是穩定資源，多樣化的穩定是更大的穩定」，明白這個道理後再讀書，「書籍才成為我的親密的朋友」。

即便是普通人，也可能因為特殊的機緣讀到圖書館的藏書。原北京四中66屆初三學生趙京興指出1967年中到年底，文革如火如荼期間，北京圖書館竟然對外開放。除了《金瓶梅》等「淫穢文學」書籍外，讀者可以敞開閱讀^⑦。1970年代各級圖書館逐漸對內部職/員工開放以後，閱讀圖書館藏書的機會增大。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對開宣傳畫《大隊圖書室》，側面反映公共

圖書館的基層性推廣⁶⁰。一些普通青工也有自己讀書的管道。1972年上海知青朱學勤結束插隊，託關係招工進豫西某化工廠當工人。憑藉與車間政治指導員的私人關係，以工廠「批林批孔寫作組」的名義，託人幫他以廠革委會委員的介紹信來獲得河南省委宣傳部的介紹信，1974年到上海書店購得300元的「內部書」⁶¹。戚本禹的回憶佐證了憑單位介紹信借書確有其事：「當時有人提出要開放圖書館，文藝組打了個報告給我。我說，文化革命是搞文化的，連圖書館都不開放不成了笑話了嗎？所以我就批了這個報告。但規定，凡是內部材料必須憑革委會的介紹信才能查閱。」⁶²

文革中，儘管政治與日常生活關係緊密，但上述例子清楚表明，政治難以對日常生活空間實現徹底的佔領，非主流閱讀日益成為知青閱讀行為中的主角，他們更因而開始對主流意識形態的灌輸產生警覺和反思。

四 文化審查與「內部書」的流通和擴散

從晚清到中共建國以後，西方文化和文學作品在中國經歷了從濟世「良藥」到反面「毒草」的轉變。1958年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已經完全破產。它對我們只有一個用處，就是當作毒草來加以研究，以便使我們有個反面的教員，使我們學會認識毒草，並把毒草鋤掉變為肥料」⁶³。1966年文革開始之初，江青明確指出西方文化「腐朽下流，毒害和麻痹人民」⁶⁴。

從1960年代開始中蘇交惡，中共中央發動了一場針對蘇共的世界範圍的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出版部門為了配合這場鬥爭，特別是對蘇「大論戰」的需要，根據中宣部指示，由中央編譯局成立了一個國際共運史資料室，與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世界知識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編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考茨基（Karl Kautsky）、托洛茨基（Лев Д. Троцкий）、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И. Бухарин）等一大批新老「修正主義」和「機會主義」份子的著作，作為「反面教材」供領導機關和高級研究部門批判之用。這類書籍封面一律採用灰色紙，比正文紙稍厚，無任何裝飾，被稱為「灰皮書」，均為內部發行，發行量和發行範圍很小，封面和扉頁上印有「供內部參考」或「供批判之用」字樣。它分為甲、乙、丙三類，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屬於甲類，「反動性」最大，「毒性」最深，購買和閱讀群體受到最嚴格的管控⁶⁵。文革期間，許立以任中宣部出版處副處長，參與「灰皮書」和「黃皮書」出版工作。他認為出於同樣的目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反映所謂「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外國文學作品，這批書籍的封面為黃色，統稱「黃皮書」⁶⁶。

1961年，第一本「灰皮書」《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借三聯書店的名義出版。1963至1964年間「灰皮書」出版最多，達百種以上。1971至1972年底，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出版發行「內部書」34種，其中發行範圍限定在省軍級的有14種，地師級的有20種⁶⁷。1949至1986年間，全國共出版「內部書」18,301種，文革時期出版近千種西方理論和文學著作⁶⁸。

徐友漁和宋永毅的研究表明：文革時期的地下閱讀呈現出的異質化特徵與「內部書」的流散有關^⑥。「內部發行」書籍是冷戰背景下中國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早在1957年，毛澤東指示內部發行《金瓶梅》、《蔣介石全集》和《赫魯曉夫全集》，其中《金瓶梅》出印2,000冊，專供四十五歲以上已婚的省軍級幹部和少數專家教授閱讀^⑦。文革後期部分知識份子的覺醒與1980年代點燃新啟蒙思想運動的火種其中一部分源自「內部書」^⑧。「內部書」的出版發行具有正負兩面的影響力，其「批判之功效如何不敢妄測，倒是有不少人因為閱讀了『皮書』，對現實產生懷疑，從而走向尋求真理的道路，這是主事者所始料不及的」^⑨。歷史學者李天綱認為這些書籍對上海1970年代的讀書生活作用很大，文化、讀書和思考因此沒有完全被阻斷^⑩。筆者所做的知青口述史也佐證了這一點。

當工農子弟和普通市民的子女想盡辦法閱讀「紅色經典」或手抄本時，城市青年，尤其是兩大階層的子孫卻在閱讀各類「內部書」和文革前出版的私人藏書。排除年齡因素，因為階層和境遇的不同，即便工農和城市平民子弟有機會看到「內部書」，閱讀體會也大不相同。被訪者S在1968年左右，從瑞安縣新華書店的書庫裏偶爾讀到《第三帝國的興亡》這本1965年出版的「內部書」，令他留下深刻印象：「我當時對希特勒印象深刻的是他能夠白手起家，爬到這個帝國最高領袖的地位，這讓我很受鼓舞。他講的『除了上帝我們甚麼都不怕』這句話對沒有自信心的農村孩子來說非常有用。」而就讀幹部子弟聚集的北師大一附中的丁東，1967年從同學處借到《赫魯曉夫主義》這本書，該書主旨是批判赫魯曉夫，「但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從斯大林時代到赫魯曉夫時代歷次黨內鬥爭的內幕。看後，不能不聯想到中國激烈的黨內鬥爭，聯想到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時期的文化審查與「內部書」的流通或擴散也有密切關係。中共的文化審查包括中央和地方兩級。中宣部負總責，在上海、南京和瀋陽等大城市當地政府的文化宣傳部門、出版社、圖書館和高校組成審查機構，1963年「查書運動」開始後，增設了專門的審查小組和辦公室^⑪；大批政治可靠的黨員「審讀員」撰寫了大量的「閱讀報告」、「出版說明」和「譯者序」，代表了國家意志下「意識形態的甄別」^⑫。然而，對文化審查的潛在抵制客觀存在。

首先，出版界特別是部分編輯的善意放行，使得「內部書」的發行範圍得以擴大，而一些幫助知青提高文化科技水平的書籍也搭上「內部書」的「順風車」，得以出版發行。從文革開始到1973年，社會環境正處於「思想飢渴與文化禁錮」的狀態，廣大的青年，特別是大學剛畢業的以及中學畢業在農村及城市就業的知青，都渴望思想文化方面的養料。尤其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編輯借中共中央出版「皮書」的批示，擴大「內部書」的發行範圍，使知青有機會讀到更多的書。朱永嘉在訪談中也佐證了這一點：「知青沒書讀，要解決這個問題啊」，「拿着雞毛當令箭，我讓人放大範圍去印，幾千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沒有書讀啊！北京下來人問，我就拿出毛的批示，頂了回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旨在「提供上山下鄉知識青年自學、進修用的一套包括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基本知識和實用技術的讀物」——《青年自學叢書》於1974年應運而生^⑬。

其次，被官方批判的反動讀物成為地下閱讀的熱門書目。1949年以後，歷經政治運動的很多中國人已經學會了從《人民日報》上領導人的排名、合影

等揣測中國大政方針的異動，「反向閱讀」成為民眾間心領神會的一種能力。文革前和文革中內部出版的「皮書」成為知青一代青年眼裏的「禁果」，他們成為這批書最熱心的讀者，按照《學習與批判》、《朝霞》、《摘譯》等刊物上發表的各種批判文章中透露的出版資訊，按圖索驥，尋找「皮書」來閱讀^⑦：

第一，讀者從那些大批判式的文學評論中，重新發現了文字、文學和思想的美與力量。《摘譯·外國文藝》1973年主要是對外國文藝的介紹，1974至1976年也刊登針對外國文藝的文學評論。其他公開發行的刊物，如《學習與批判》上有時也發表批判外國文藝作品的文章，通常會附有外國著作的內容梗概。對於讀者而言，這實際上是簡約式文學閱讀的讀本。第二，就形式而言，「灰皮書」中「譯者序言」、「編者按語」和黑體字「反動觀點」的作用，相當於推薦詞。根據中宣部的指令，每本書不管是專著、單行本，還是言論選編，都必須有一篇編譯者序言。序言一定是立場非常堅定、觀點非常鮮明的批判文章。除編者按語外，每篇文章前面必須有個提要，把編者認為文章中最反動，修正主義、機會主義最明顯的觀點做簡介，最明顯的反動觀點一律用黑體字標註出來^⑧。第三，箝制成為潛在的啟蒙，文化審查者反倒成為知青的閱讀領路人和推薦人。鄧剛坦承1970年代他們並不知道哪些書好看，後來留心報紙廣播上批判哪些書，「就像給我們開讀書目錄似的，我們立即就去淘弄甚麼書，很有點樂不可支。我貪婪地讀着法國、英國、西班牙、俄羅斯和蘇聯的小說……有時，我讀到昏天黑地，猛然放下書本，覺得眼前的世界不真實，但頭腦裏產生的世界比真實更美妙」^⑨。針對「蘇修小說」《特別分隊》、《圍困》和《熱的雪》的批判，則在封閉禁錮中掀開了外部世界的一角；意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和修正主義思想的《學習與批判》，卻起到了推薦其所否定的作品的作用。這些大概都在文化審查者意料之外。

對知青一代而言，「灰皮書」的出版和傳播，破除了「個人迷信」和「領袖崇拜」心理，促進了獨立、理性地思考國家和自我的未來。隨着上山下鄉運動的發展，這些思考逐漸成為1980年代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先聲^⑩。它引起了中國學界衝破學術禁錮，了解世界，研究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真實歷史、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各種流派的真實情況、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真實情況，以及了解國外學術動態的強烈興趣^⑪。

五 「毒草的守護者」與「無書可讀」？

上山下鄉時期，一些「毒草的守護者」——軍代表和連指導員等也對知青閱讀提供方便。他們這麼做有些純屬於人的良善之舉（知青總歸要回城的；年輕人多讀點書沒壞處）；也有些是懾於知青群體在當地的勢力和能力，或者二者皆而有之。

軍代表在以往的記述中似乎是粗魯、沒有文化的代表。印紅標在京郊煤礦的軍代表卻要求知青多讀書。這位軍代表寫過長篇小說，第一天對年輕礦工訓話就問誰通讀過《毛選》，發現一個也沒有後便說：「你們不行啊，你們要讀書，讀《毛選》從第一卷，讀到最後一卷。知識份子和工人結合以後，就會發

揮無窮無盡的力量。」他發現軍代表的講話與報紙上宣導的知青要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做工農兵的小學生這個論調完全不一樣。另一位被訪者L的工廠位於京郊南市口，軍代表來自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共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這位軍代表不但為全廠做政治報告，而且帶領工人學習《毛選》和新的政策文件。

此外，少數知青群體在下放地佔據政治、經濟和文化主導權，他們的公開閱讀和學習甚至得到當地的支持。曾在黑龍江省呼瑪縣金山公社察哈彥生產隊插隊落戶的上海知青群體就是一例。首先，知青佔據壓倒性的人數優勢，1969年底到1970年初有207名「插隊人」，「原住民」只有100餘人，這一人口比例持續了十年之久。其次，地處中蘇邊界，武裝民兵的槍支幾乎都由知青掌握，知青既有鋼槍在手（槍桿子），又能言善辯（筆桿子），而且因為聰明能幹和特別團結，農閒時集體外出打工等行動極大改善了集體經濟，使得他們下鄉後迅速立足並執掌地方權力。察哈彥知青讀書自學風氣很濃，縣裏的領導幾次來此視察工作，最喜歡聽他們「傳達」中央最新文件和高層動態（許多常常要到半個月後才會通過正式管道一級一級傳達到縣團級），看到大家自學討論的情景，他們都要感嘆幾句：「察哈彥的知青那麼愛讀書愛學習，呆在這裏白瞎了。」^②

文革中「無書可讀」這種論調在民間流傳甚廣。除了階層因素外，還有時間節點的問題。對於大多數平民階層出身的知青而言，如果1966至1970年是不許讀、也無書讀的階段，那麼隨着1970年部分大學開始恢復招生、「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則使部分社會青年和知青看到通過讀書改變命運的希望。1970年5月27日，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一些高校貫徹「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招生辦法，舉辦了各類專業試點班。1973年中央開始着手整頓知青工作，其中部分內容就是給知青提供文化教育的條件。同年4月27日（即毛澤東給李慶霖回信後的第二天），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高層會議，討論知青問題。針對知青缺乏書籍報刊等學習資料的問題，周指示「要給青年精神糧食」^③。其後將毛主席的覆信印發全國。6月22日至8月7日，國務院又召開了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中共開始着手糾正這一運動中存在的「左」傾錯誤，調整政策，使涉及全國千家萬戶的運動由高潮走向終點^④。1974年上海開始在部分知青的主要流入地試辦知青業餘函授教育^⑤。同年，周恩來、張春橋和姚文元先後推動《青年自學叢書》的出版和宣傳，這套叢書面向知青，共計五十一種，囊括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各領域的基礎知識和技術^⑥。

事實上，國家和地方層面對知青的教育都不曾放鬆。早在1955年8月，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在北京歡送志願墾荒隊大會上的講話中勉勵青年業餘時間要好好學習，要學文化，看報紙，「希望你們不單單勞動好，而且還要學習好」^⑦。根據《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自1950至1980年代，全國三十二個省市自治區中，有二十個地區記載了知青閱讀的相關資料。儘管以政治教育為主，但在涉及政治、文化、生產/技術教育三方面採取了不少舉措，有心向學的知青總能找到獲取知識的途徑。這些舉措主要有五方面：（1）組織高校編寫各類學習及考試教輔資料。北京知青上山下鄉辦公室自1974年起，編寫政治、生活、文學、衛生學習及高校招生考試各科教材及

輔導教材，還組織高校教師編寫各類毛選、寫作知識、詩歌寫作常識、古文譯註、中國和世界古代史、近代史等；(2) 與各地廣播電台合辦函授教育。舉辦毛澤東詩詞、魯迅雜文、詩歌學習班，「創傷救護班」和農技訓練班等，北京知青函授教育辦公室與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聯合舉辦關於歷史、文學、文化和專業技術的廣播講座；(3) 通過慰問團向去外省、區下鄉的知青贈送圖書。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公室在1968至1975年間，給知青贈書425萬多冊；(4) 河南、雲南等地建立包括中心圖書館、場隊圖書館和流動圖書館等各級圖書館。1973年「李慶霖事件」之後，河北知青點建房時，圖書室、學習室成為跟宿舍、伙房和倉庫等一起必建的標準配備；(5) 四川、遼寧、福建等地在各知青場、隊、點建立了學習制度，舉辦半農半讀學校、政治夜校、業餘大(中)學和「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等。遼寧的做法得到國務院的肯定，並向全國介紹了他們的經驗，一些先進村莊的圖書館也成為外賓參觀的對象⁸⁰。

因此，只要有心向學，無論是甚麼家庭出身，無論文革中處境如何，無論是在農村、城市，還是監獄，知青都有條件讀書，並且也能找到可讀之物，區別在於讀書的數量、質量和時機等。楊曦光(楊小凱)出身於「黑五類」家庭，文革爆發時就讀於長沙一中高一，因為撰寫〈中國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調查報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尤其是1968年的〈中國向何處去？〉等大字報，1968至1978年因反革命罪服刑十年。即便在長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羈押時期，他也設法「找了位教師學英文，找了位電機工程師學電機，找了位機械工程師學機械製圖」。此外，他還學習數學，閱讀《世界通史》、《資本論》和《毛澤東思想萬歲》，並且立志成為經濟學家⁸¹。「紅二代」電影導演、被訪者周七月在獄中曾撿過便池中用過的《參考消息》，清洗後閱讀，還自學家人送來的醫學書籍，成為監獄醫生。

六 結論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文革時期知青一代的知識和閱讀飢渴是階層化的產物，城市幹部和知識份子兩個階層的子代是知青個人閱讀行動中的主體，上山下鄉運動中他們進行了比較廣泛的個人閱讀；比較而言，工農子弟的閱讀飢渴不顯著。隨着文革的爆發及風雲詭譎式發展，學校的正統教育被暫時打亂，有些家長也因受到衝擊而被迫放鬆對子女閱讀的管制；家有藏書或者有讀書管道的知青一代有機會大量自由閱讀，正統的「紅色閱讀」開始被西方人文主義內容所衝擊並部分替代，多元化的閱讀與自學由是開始。隨着上山下鄉運動的開展，書籍報刊(尤其是「內部書」)經歷了從城市到農村，由兩個精英階層向工農階層的擴散現象。本文對文革時期知青一代個人閱讀的重新解讀，表明閱讀行動是一個雙重過程：文化價值的重新確認和文化資本的積累。

知青一代因知識結構受到政治運動的擠壓，缺乏完整的學校教育，由此決定了這一代很多人的學識基礎並不牢固。然而，他們的個人閱讀積累在考大學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出身精英階層的知青而言，閱讀不單是學習一種技能，更是延續一種生活方式，保持身份、地位的途徑，最重要的可能是

尋找意義，建構對自我和社會的新認同的過程。低功利性的閱讀是難得的人生體驗（1970年以後因為逐漸恢復高考，「大學夢」重新與功利相連），這或許是文革日常生活中不多的一個亮點。

本文提出「個人閱讀階層化」的觀點，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探討文化長存還是制度長存的問題，指出旨在使民眾「在思想和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文革，對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以及「學而優則仕」這類曾經長期根植於科舉制度的傳統價值的撼動似乎很有限。對文革時期知青一代閱讀行為的研究，讓我們重新認識文革中曾經風行一時的「讀書無用論」和反智主義論調與政策，如何與身處革命洪流下的民眾的日常生活相互作用與共生，閱讀如何在日復一日地踐行中，重新確認和構建出階層化的文化價值，並以此最終推動制度發生變遷。

註釋

- ① 參見康曉光等：《中國人讀書透視：1978-1998大眾讀書生活變遷調查》（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胡洪俠、張清主編：《1978-2008私人閱讀史》（深圳：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2009）；劉小磊主編：《我書架上的神明：72位學者談影響他們人生的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Shaoguang Wang, Deborah Davis, and Yanjie Bian,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Book Reading in Urban China", *Modern China* 32, no. 3 (2006): 315-48。
- ② Perry Link, "Hand Copied Entertainment Fiction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17-36.
- ③⑩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170-212；173。
- ④ 潘鳴嘯（Michel Bonnin）著，歐陽因譯：《失落的一代：中國的上山下鄉運動1968-1980》（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頁330-42。
- ⑤ Guobin Yang, *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9-41.
- ⑥ 鄒振環：《20世紀上海翻譯出版與文化變遷》（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319-48。
- ⑦ 蕭瀟（宋永毅）：〈書的軌道：一部精神閱讀史〉，載廖亦武主編：《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頁4-16；Song Yongyi, "A Glance at the Underground Reading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 no. 51 (2007): 325-33。
- ⑧ 楊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學》（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2013）；白士弘編：《暗流：「文革」手抄文存》（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沉淪的聖殿》。
- ⑨ 王奇生：〈蔣介石的閱讀史——以1920至1940年代《蔣中正日記》為中心的探討〉，載呂芳上主編：《蔣介石的日常生活》（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頁231。
- ⑩ 「老三屆」指生於1947至1952年，於1966至1968年畢業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作為對照，本文還將關注文革時期的小學生和大學生。因此，研究對象的出生年份介於1945至1959年之間。
- ⑪ 定宜莊：《我怎樣定義「知青」》（2015），未刊稿。
- ⑫ 「職員」指機關、企業、學校、團體裏擔任行政或業務工作的人員。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編：《現代漢語詞典》，試用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73），頁1324。

- ⑬ 本研究中的知青，不包括回鄉知青、幹校知青（很多是北京機關子弟，享受一半的知青政策），也不包括在南京等地存在的「準知青」（全家下放，隨父母來到下放地，十六歲以後按照政策回城）。
- ⑭ 其中日記和筆記部分來自被訪者的贈送。海外收藏方面，主要有墨爾本大學圖書館和新南威爾士藝術館收藏的日記，其中前者有184本知青日記，後者有3,000本民間日記，包括1960至1970年代的知青日記。參見楊國斌：〈旅美學者楊國斌談澳洲的文革日記收藏和展覽〉，《昨天》，第55期（2015年7月30日），http://prchistory.org/wp-content/uploads/2014/08/Yesterday_55期-.pdf，頁63-68。
- ⑮ 金光耀、金大陸主編：《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共六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該著窮盡了中國大陸1960年代以來出版的五千多部地方志中所有有關知青上山下鄉的資料。
- ⑯ 漢斯林（James Henslin）著，林聚仁等譯：《社會學入門：一種現實分析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79-84。
- ⑰ 李大同口述：〈草原歸去來〉，載米鶴都主編：《回憶與反思：紅衛兵時代風雲人物——口述歷史之二》（香港：中國書局有限公司，2011），頁274、278-79。
- ⑱⑲ 張春橋：《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244、247；246-47。
- ⑳ 李麁：〈歷史的面孔：對話盧漢超〉，《城市中國》，2015年11月號，頁116-18。
- ㉑ 文中訪談內容，均來自筆者自2014年9月至2016年7月在京滬兩地所做的訪談，下引不再另註。
- ㉒ 參見楊健：《1966-1976的地下文學》，頁208。
- ㉓ 有關大院的精神文化，參見米鶴都：〈大院的精神文化——紅衛兵運動起源剖析〉，《炎黃春秋》，2016年第2期，頁40-46。
- ㉔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大事記（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4），頁57、62、78、137。
- ㉕ 劉輝宣：〈昨夜星辰昨夜風：北京四中的紅衛兵往事〉，載北島、曹一凡、維一編：《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北京：三聯書店，2012），頁69。
- ㉖ 韓少功：〈漫長的假期〉，載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562-84。
- ㉗ 1966年「破四舊」開始後，懾於紅衛兵小將的打砸搶抄抓，涉嫌「四舊」的物品，比如圖書等被民眾自行處理。1966年「紅八月」中，北大技術物理系63級330班有些喜歡讀書的學生去市內廢品站向排隊處理書籍的人買書。1966年12月，俞小平也隨同學以廉價購買馬列著作為名，設法拿到系辦公室開具的介紹信，外帶「當時最好的行賄材料」——幾份紅衛兵小報，去位於北京東郊的燕京造紙廠買書。在其所住的420宿舍中，這種購書活動持續了半個多月，直到軍代表進駐以後，在討論「問題學生」的問題時，竟然發現幾位積極收集書籍的同學牀底下的各類圖書估計有一噸之重，淘到大量歷史、哲學、文藝著作等。同班同學何子溪的回憶為此做了佐證，他將文革淘書視為「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救贖」。參見俞小平：〈文革高潮，書山探寶〉、何子溪：〈文革中的一次自我救贖——廢品收購站尋寶記〉，《記憶》，第143期（2015年11月15日），頁55-57、60-64。
- ㉘ 參見《暗流》，頁337。
- ㉙ 文革時期，一些返城過春節的知青因為學緣、地緣、業緣等關係聚集在一起，組建了一些地下文化沙龍。他們為了找到一本好書，得騎車到處跑，不僅跑，還得有「等價」的書交換。交換書籍把各類沙龍串在一起，當時流行的詞叫「跑書」，地下文學作品應運而生。參見查建英主編：《八十年代訪談錄》（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67。
- ㉚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頁242-45；趙園：〈非常年代的閱讀（上）〉，《書城》，2016年3月號，頁37；李零：〈七十年代——我心中的碎片〉，載《七十年代》，頁245。
- ㉛ 張鳴：〈求知若渴的年代〉，載《張鳴說歷史：朝堂上的戲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頁222-23。
- ㉜ 例如「林彪事件」對閱讀的影響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國家對書籍的管制放鬆；其次，閱讀範圍擴大；最後，對知青一代思想上的觸動。因為種種原因，時隔多年，被訪者的敘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錯漏、重構和再造記憶的問題，「林彪

事件」對個人閱讀無影響的記憶便是一例。除此之外，部分被訪者認為「林彪事件」對自己的閱讀毫無影響，這恰好說明閱讀存在地域和階層的差異。

③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1952-55、1957、1959。

④ 蕭輝、韓雪楓：〈萬伯翱：做萬里的兒子不容易〉，《新京報》，2015年7月22日，A14版。

⑤ 萬伯翱：《紅牆內外》（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頁59-67。

⑥ 張刃：〈插隊讀書記〉，《炎黃春秋》，2010年第9期，頁69。筆者發現張刃此文所提的書名有誤。對書名的校勘，參見中國版本圖書館編：《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6》（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98。

⑦ 張刃：〈黃土地：那年·那人·那事〉，《黃河》，2010年第4期，頁92。

⑧ 金大陸、林升寶編著：《上海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紀事錄（1968-198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4），頁93、103。

⑨ 蕭功秦：〈追求思想者的坦蕩之樂〉，載曹保印編：《精神歷程：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205。

⑩⑪ 李銀河：《人間採蜜記：李銀河自傳》（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頁62；51-56。

⑫ 鄒烈山：〈憧憬是照亮心空的太陽〉，載《精神歷程》，頁87-88。

⑬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9.

⑭ 「思想性社交」是指通過沙龍、咖啡館和報刊等文學和政治公共領域進行討論、爭論。參見夏蒂埃(Roger Chartier)著，洪慶明譯：《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南京：譯林出版社，2015），頁217。

⑮ 文革時期「紅色經典」充斥市場，外國名著與中國古典文學供應缺乏，而且許多書店關門或書架上無書/無可讀之書。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年青一代通過各種「越界」行為找書來讀。但是創作、閱讀及傳播「禁書」和「反動歌曲」的後果嚴重，1970年任毅因創作《知青之歌》被捕，並判刑十年；張揚因寫作小說《第二次握手》屢遭迫害。

⑯ 解璽璋：《一個人的閱讀史》（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頁4。

⑰ 柳白：〈一弦一柱思華年——小記文革中的北海茶館〉（2012年4月12日），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968675010116a1.html。

⑱ Rhineman：〈我在文化革命時期（1966-1976）如何自學英語〉（2013年4月22日），凱迪網，<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148694>；〈活在心中的歷史：一位摯友的留美回憶錄（1988-94）〉（2013年7月1日），凱迪網，<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9323067>。

⑲ 參見劉青峰、黃平：〈《公開的情書》與70年代〉，《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頁96-101。

⑳ 魯雙芹：〈琥珀中的年月〉，載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續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91-92。

㉑ 虞雲國：〈私人閱讀的兩個30年〉，《南方周末》，2015年10月8日，C24版。

㉒ 吳亮：《我的羅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頁30。

㉓ 金光耀：〈朱永嘉與他的「文革口述」〉，載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鄧傑整理：《巳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香港：大風出版社，2014），頁VI。

㉔⑵ 朱學勤：〈「娘希匹」和「省軍級」：文革讀書記〉，《上海文學》，1999年第4期，頁60-65。

㉕ 王知常口述，金光耀、金大陸、李遜採訪，諸穎政、李信之整理：〈我與《學習與批判》等刊物〉，《炎黃春秋》，2015年第3期，頁26-30。

㉖ 丁東：《精神的流浪：丁東自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12），頁38-40。

㉗ 陳思和、邵寧寧：〈知識份子的崗位意識與人文情懷——陳思和先生訪談錄〉，《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頁55-62。

㉘ 趙京興：〈我的閱讀與思考〉，載《暴風雨的記憶》，頁349。

㉙ 汪耀華編：《「文革」時期上海圖書出版總目，1966-1976》（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頁301。

- ② 戚本禹：《戚本禹回憶錄》，下冊（香港：中國文革歷史出版有限公司，2016），頁691。
- ③ 陸定一：〈要做促進派——為「江海學刊」創刊號作〉，《人民日報》，1958年3月14日，第7版。
- ④ 江青：《在首都文藝界大會上的講話》（1966年11月28日），載《江青同志講話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頁21。
- ⑤ 鄭異凡：〈從「灰皮書」到「人民文庫」——「灰皮書」的來龍去脈〉，載鄭異凡主編：《「灰皮書」——回憶與研究》（桂林：灕江出版社，2015），頁8；方厚樞：〈內部發行圖書出版的歷史記憶〉，《黨史博覽》，2010年第12期，頁5。
- ⑥ 許立以：《春天的腳步——許立以回憶錄》（北京：華齡出版社，2012），頁319。
- ⑦⑩ 方厚樞：〈內部發行圖書出版的歷史記憶〉，頁4-6。
- ⑧ 根據「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6）分類統計」表格整理，參見《全國內部發行圖書總目，1949-1986》，扉頁。
- ⑨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頁211-22；Song Yongyi, "A Glance at the Underground Reading Movement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25-33。
- ⑪ 王堯：〈翻譯的「政治」〉，《南方周末》，2006年11月16日，C24版。
- ⑫ 沈展雲：〈小引：何謂「皮書」？〉，載《灰皮書，黃皮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頁2。
- ⑬ 參見陳丹燕：〈「你到底要甚麼」：白皮書時代的往事〉，《書城》，1998年4月號，頁5-6。
- ⑭ 劉陽：〈「內部發行」：冷戰背景下的一種特殊文化現象（1951-1978）〉（華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 ⑮ Roberta Darnton, *Censors at Work: How States Shaped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 59-61.
- ⑯ 〈為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出版大批讀物〉，《文匯報》，1974年12月20日，第1版。
- ⑰ 高智紅：〈誰的選擇？重要他人對學生課外閱讀選擇的影響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2）。
- ⑱ 殷敘彝：〈關於「灰皮書」和國際室的回憶〉，載《「灰皮書」：回憶與研究》，頁60-62。
- ⑲ 鄧剛：〈我曾經是山狼海賊〉，載《七十年代》，頁356-57。
- ⑳ 鄭瑞君：〈「灰皮書」、「黃皮書」在社會的流傳及其影響〉，《新聞界》，2014年第22期，頁40-46。
- ㉑ 胡文建：〈「灰皮書」的二十年與我和同事們半個多世紀的學術生涯〉，載《「灰皮書」：回憶與研究》，頁84。
- ㉒ 劉琪：〈我要讀書——1970-1977在黑龍江農村七年的學習活動〉，載察哈彥知青集體編寫：《察哈彥知青紀事》（上海：自印，2013），頁218-26。
- ㉓ 顧紅章主編：《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頁105。
- ㉔⑦ 參見蔡天新：〈李慶霖上書毛澤東與知青政策調整〉，《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4期，頁30-35。
- ㉕ 林升寶：〈上海《青年自學叢書》述評（1973-1975）〉，《中共黨史研究》，2015年第2期，頁89。
- ㉖ 〈關於出版《青年自學叢書》問題的函〉（1973年8月），上海市檔案館，B167-3-217。
- ㉗ 《中國新方志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輯錄》，頁1258、36-37、2220、3334、4716、155、4227、624、3207、133。
- ㉘ 葛劍雄、丁東、向繼東主編：《望盡天涯路：當代學人自述》（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13），頁190-93。